

革命在他方？

此刻記憶1980年代

吳介民

Speak --

But do not separate the no from the yes,

Give your saying also meaning:

Give it its shadow.

——Paul Celan, “Speak, You Too”

台灣，1980年代，是抖落恐懼的年代。但恐懼消散得不徹底，有些是歷史頑固的殘留，有些則是當年事件的餘緒。這是追索1980年代時，浮現腦裡的第一個命題。

這篇文章緣起《思想》編委汪宏倫的邀稿，不久即草擬了一份大綱，卻遲遲無法下筆。月餘，主編錢永祥來信說：

盼望您寫作的時候放鬆心情，無妨以較為 personal 的方式 indulge 一下。您有空的時候，何妨一讀尉天驄先生近著《回首我們的時代》？我個人是很受感動的。不過其中人物絕大多數已成古人，您們當然還未到那個階段。

「古人」兩字讓我心頭一顫。回想那日漸遙遠的年代，朋友如今安

在？我想起幾個逸失、自殺、癡狂的名字，曾為他們的故事夜半難眠，寫下私密告白；我一廂情願認為，某些友人之逝去不過是不告而別的逃離，逃離這歷練我們的、不徹底抖落恐懼的時代。我們正在變成「古人」。但請讀者不要誤讀我的訊息，1980年代其實是個充滿熱望、令人精神抖擻的年代。

原先草擬的題目是：〈抖落恐懼：1980年代的台灣〉。大綱如下：(1)The Long Decade(社會抗爭的長年代,1977-1992年);(2)1986年(自由化的關鍵時刻);(3)個體經歷(時代炙焰下朋友們搖晃前進的身影);(4)改革或革命(在第三世界反抗運動中找尋類比)。按照這個規劃，佇在電腦螢幕前爬格子。同時分析文件檔案，也努力搜尋記憶庫，許多塵封往事便經常在睡夢中或身體鍛鍊的時刻泉湧而出。這樣經過一個月，仍寫不過兩千字。困難在於，按照原計畫必須把時代大敘事與小圈子經歷見聞做有機扣連，但沒想像中容易，畢竟個體經驗太有限、太局部。想要在宏觀與微觀之間自由跳躍，仍只是遐想。我怕大敘事的鋪排過密而失去寫作此文的初衷；也怕個人故事的深描讓時代失焦。焦慮的日子裡，有天到張富忠紅樹林住處聊天，他很興奮地跟我說，剛看了吳耀忠紀念展，有一百多幅流落各處的畫作被找到，還配合系列講座，「非常動人的故事。」回程在地鐵上憶起：一年前在新竹，到林麗雲、陳瑞樺家裡晚餐，他們提及正在尋找吳耀忠的畫作。沒幾天，收到瑞樺寄來《尋畫》。這本畫冊回憶錄，改變了我寫作這篇文章的計畫，決定接受錢先生的提議，「indulge一下」。

心愛的，不能輕浮

2012年2月23日近午，我發了一封信給朋友們：

「對於心愛的人，絕對不能輕浮。」這是尉天驄描寫吳耀忠的浪漫愛情觀讓我醒來的一句話。

晨起讀書，拿起《尋畫：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》¹，看著這位不曾見過面的「革命」前輩的畫，聽他老友們的回憶，不覺已近中午，我必須急急出門去，但忍不住要先寫下這幾行字。

陳映真以許南村筆名訪問吳耀忠的那篇1978年舊作(正是鄉土文學論戰的時代啊)，如今讀來仍令人興致高昂。其他人筆下靦腆不善於言辭的畫家，在他幾十年老友的訪談中，談話是如此切中要害而深刻。吳的若干話語，經過陳的文筆，竟顯得具有專業術語涵養的理論性。從閱讀中醒來的一刻，幻覺似在和平東路巷子裡的「人間」，以及距離人間不遠的老任水餃店，看到了陳映真和他的兄弟人馬，他朗爽的笑意，他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(我是愈到後來，才能覺知到他之所以堅定的原因)，他對年輕人的愛護照顧。這麼多年了，應該要把陳映真的小說再拿出來讀。

「對於心愛的人，絕對不能輕浮。」

謝謝麗雲、瑞樺，以及不認識的淑芬，你們的努力，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戰後台灣左翼的視覺。

通常，朋友們對我的群組信反應遲緩。這次不一樣。畫家「不能輕浮」立刻打動了好幾人，包括一位在北京打拚的詩人。拍紀錄片的T說：「我在網路上訂了這本書，感覺是個好的紀錄片題材，你認為呢，關於早期台灣的左翼。」M：「吳耀忠那一輩的人，有

1 林麗雲、蘇淑芬、陳瑞樺編(台北：遠景，2012)。

的人是以一種存心求死的方式過活，吳耀忠並不是唯一的。施明德的哥哥施明正不也絕食至死？……吳耀忠是走不出那個時代的人；已經走過的人，很難了解他們為什麼走不出來？」還有一個偶然的發現：1982年一個事業剛起步的企業家在李南衡引介下，贊助吳耀忠作畫，並送他好酒；吳耀忠回贈幾幅素描。另有三人不約而同，對我信中一句話深表好奇：

他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(我是愈到後來，才能覺知到他之所以堅定的原因)。

他們的詢問，一層是：陳映真民族主義立場堅定的原因是什麼？另一層是：為什麼愈到後來，才能覺知到他之所以堅定的原因。這兩層如麵團揉合在一塊，無法分開回答。

2012年2月23日，晚間寫了一份筆記，回應朋友們的「疑惑」：

覺知是一段長期體會的過程，因此，說我覺知到「原因」，這可能是內在心靈圖像所連接的因果鎖鏈的一環吧。

陳映真是個祭司；他所凝結的祭司圈不大，但凝聚力很強；他的光芒持續吸引著渴望神聖性卻徘徊在聖堂外的靈魂。

我20歲出頭時，第一次在尉天驄教授家與陳映真碰面，一道前往的，記得有吳叡人。那時的我，天真而無知，還沒有讀過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要文本，認為陳映真是在國民黨大中華思想的籠罩下為台灣本土(鄉土)書寫尋找一條出路。我還是一個懵懂的文藝青年，以「隱蔽書寫」解釋陳映真文字中的政治訊息。這次見面後很久，仍經常回憶，那個晚上陳映真已經在為後文革的中國發展進行他自己的批判思考。〈山路〉寫作於1983年。

當晚，我們對於中國的「走資」與官僚腐敗激烈討論。陳映真告訴我們：中國只要還有劉賓雁這種人存在，中共與中國就有希望。當時，台灣有一小群讀者正閱讀討論著劉賓雁的《第二種忠誠》。但是，後來中共也容不下劉賓雁了，他流亡國外，最終客死異鄉。（劉賓雁1985年當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，1987年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開除黨籍，1989年他抗議六四鎮壓後被逐出作協。）我沒機會再跟陳映真討論。但觀察他後來的言論與行動，顯然這些事件都沒有動搖到他的本源信仰。

陳映真的左翼教義，是建構在中共革命的進程上，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，則更進一步建構在反帝國主義侵略上。因此，這種左翼信念，在實踐中腐化或壓迫他人而遭遇批判時，可以在不斷上綱的反帝鬥爭中得到正當化的辯解（justification）。反帝的最終目的是達成中國兩百年來最重要的國族使命：富國強兵之現代化。（最大的弔詭於是浮現：國家資本主義服務於富國強兵，因而變成可容忍的、可欲的、可讚頌的。且暫時不談這個國家資本主義降落到官僚與私人利益的層次，已經產生哪些問題。）

陳映真，在他的教養過程中，左翼價值（通過中共作為歷史中介者的中國民族主義，進而在建國後的實踐與鬥爭中[反右、大躍進、文革等]轉化提煉為毛主義）在他的身上有著刻骨的烙印。他的家庭教養中的基督教人道主義養分；他青年時期為了左翼思想坐過右派國民黨的牢獄；他中期在反思中國文革到「改革開放」這段期間的作品，體現了轉變的壓力與淬礪。他的這種毛派中國民族主義的信仰，即使遭逢〈山路〉裡頭的「蔡千惠精神危機」仍然捱過了。蔡千惠對「走資」的自我批判，以

及她的「求死」（表象上無理由的失去生命力），不是對革命的左統路線的否定，剛好相反，是對革命理念的最後一次獻身。是一種漠視現實性的，只想往革命火焰中撲跳的衝動。

陳映真為左統的理念獻身。他的獻身使他成為台灣左統的精神領袖。無法想像他能夠脫出這個他為自己獻身而打造的「聖堂」。他是這左統聖堂中「政治團契」（political fellowship, political communion）的祭司。情感認同中存在著複雜的層次：從最高層次的價值理念到日常關係中的親密性。反帝是陳映真左統的理念層次；而在左統信仰者日常生活中的親密互動，則需要日復一日的政治團契來滋養經營。也就是在這種政治親密關係（political intimacy）中，左統教義在生活中改造人、灌輸並強化信仰。這種生活的一個典型場所是監獄，以及出獄後的難友互助團體。藉由這個圈子將獻身精神拓展出去。政治團契，就像所有的宗教活動一般，是一種政治存在的模態，在團契中，政治教友伸出援手給尋找道途的人、落單的人、孤獨的人、謫妄的人、不受祝福的人、被排擠的人、殘疾的人、畸零的人、天才尚未得到賞識的人。慕道友們從祭司和教友的手感覺到溫暖，而重拾生命。這個團契原則適用於所有的政治教義，但是在台灣的政治史脈絡中，惟獨左統的「神聖性」特別高，是因為：

1. 白色恐怖時期遭壓迫屠殺；歷史記憶遭壓抑或遺忘。
2. 左派思想（馬克思主義經典、舊俄新俄革命文獻、中國1930年代左翼文藝、中共革命史等等）猶如《新約》般的魔力。
3. 左統信仰曾有一個遙遠的「祖國」在支撐；而當這個祖國質變了、逼近了、神聖性跌降到塵世，左統教義便以一個更高的原則，亦即反帝，來過濾、屈光（refract）祖國之現實性的逼臨。

所有的質問被無上地置入括弧——這是個不能質問的禁區。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左統精神，若置入當代中國的政治脈絡都顯得稀罕。因為在那裡，「思想」必須受到現實的拷問。

左統的神聖性，恰恰需要其非理性主義的、忽視現實的眼光
的凝視，才能夠存在。反觀台獨運動，其神聖性一直難以建構，
正因為台獨思想必須在帝國夾縫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日常
現實中時時受到嚴刑拷打。

神聖性來自玻璃光罩中的掩映火苗。

反覆觀想這份筆記，終究沒有寄出「回信」。原因？疑慮。我知道統獨左右這問題在我們社會很難談清楚，牽扯太深的情感與信仰。一份簡短筆記難以充分表達複雜意念。需要深挖，才能抵達讓我感覺舒坦的堅實岩盤。當然，我與朋友間有基本的信任，但終究沒有按下「傳送」。

「社會人的本質：群聚壯膽」。惟此刻需要獨處。情緒躑躅的這幾天，我隱遁在那個年代閃爍的光影中。

說吧！流言

我一直認為1977是當代台灣政治地盤裂變的關鍵年，也是1980這個長年代的肇始。那一年之不尋常，在於統治團體對付本土勢力興起的招數有失靈的跡象，而且來勢洶湧。1977年秋天我和弟弟在三重埔一家小型兒童膠鞋加工廠工作，那一年我15歲，弟弟14歲，都是童工。那工廠設在一排「販仔厝」（廉價公寓）的一樓，專做出口。我做裁切，弟弟在輸送帶上粘貼鞋面。每天下午三點多，十幾分鐘休息，總有一攤蚵仔麵線出現在工廠門口。記得入冬之後某日，

賣蚵仔麵線的阿伯跟我說：「少年仔，你敢知影中壢分局去予人燒去矣！」我問他為什麼，他說：因為民眾抗議國民黨在縣長選舉中「做票」。這件事我當時半信半疑。小時候，常聽當地方記者的父親在家裡講政治社會事件；我還記得1975年在宜蘭目睹街頭抗議，回家問大人，知道是郭雨新在增額立委選舉中被大量「廢票」給做掉。麵線伯仔告知中壢分局遭火燒後幾天，報紙真的大幅刊登了這個消息：11月19日開票那天，民眾發現國民黨有做票嫌疑，聚眾包圍中壢分局，一個抗議者遭警方擊斃，憤怒的群眾放火燒了分局。這個「暴動」的消息，被官方「新聞協調」、「淡化處理」而幾乎封鎖了一個星期。原來麵線伯仔的消息是真的，他比官方透漏的早了好幾天。這件事在我年輕心靈留下深刻的印記。

我們全家在三重待了四年(1977-1981)。「三重時代」的第一年，我們三兄妹都輟學，家裡租了一間三角窗店面賣自助餐，一開始生意不好，兩個男孩才去鞋廠工作，不到一年生意做起來了，就離開工廠在家幫忙。三重時代的往事如今仍鮮活著——

弟弟有天夜裡驚醒，說做惡夢，我問什麼夢？他說夢見大熱天阿媽煮了一碗滾燙的紅豆湯要他吃下，便一驚而起，全身冒汗。那時候，我們店和家一體，在一個傳統市場街口，就十幾坪大，靠街兩面有騎樓，白天擺上活動餐桌，晚上休息鐵門一拉，完全密閉的空間。老爸在這個狹隘的店家，設計了一個簡單的夾層(duplex)，我們三個小孩睡頂層，匍匐出入，無法站立。有電風扇，但夏天還是悶熱難受。

輟學一年後，我參加私立高中聯招，讀景文高中夜間部。有天，教官在軍訓課上說：治安單位在康寧祥（當時是增額立法委員）的萬華服務處發現一批警察制服。那陣子國民黨的內外危機

逐漸嚴重，1978年底美國與中國建交，切斷和台灣的外交關係。傳言紛飛，空氣中瀰漫不安，但是我的年紀與我的生活環境只能捕捉到當時政治氛圍之一小部分。以美麗島雜誌社為核心的黨外運動正快速拓展。記得當時家裡也有幾本《美麗島》。這個教官散佈的謠言，連同那個麵線伯仔被證實的傳言，一直留存在我的內心。國家vs.民間，謊言vs.真實，暴力vs.反抗。這些都是年少親身經歷中學到的政治社會學ABC。

有個景文高中同學「阿祥」，白天在三重做工(黑手學徒)。那時我已經從遠在木柵的景文，轉學到自助餐店附近的東海中學夜補校(二重埔)。有天他來找我，攤開手掌，說：幾天前被機器壓斷一隻手指。無奈卻一副故作輕鬆的表情。斷指阿祥後來給我一支扁鑽，拿報紙包著，要我幫他保管。他再也沒出現過。而那支代藏的扁鑽，我擱在自助餐檯下的抽屜裡(幾次夜晚收攤後，趁家人沒注意時拿出來端詳)，我們搬離三重後就不知去向了。(Ha，我想到《教父》第二集，不過老柯理昂卻把代為保管的手槍派上用場。)

有段時間，經老爸「特許」，在自助餐店門前騎樓，我開了一家魷魚羹麵攤當「副業」，目標顧客是附近國小學童。為了跟對巷另一攤麵店拚生意(那攤生意興隆)，我推出(可能是)台灣歷史上第一套「兒童餐」。那時離麥當勞進入台灣約有七年之久。我賣一碗五塊錢的羹麵(對面那攤正規的成人餐一碗十五塊)，沒有魷魚丸子，僅有勾芡加幾片葉菜。推出後，果然搶到不少小鬼的生意，中午下課經常蜂擁而至。但不到兩個月就收攤，因為利潤太薄。我的第一次創業，就這麼草草收場。

經營小針織廠失敗的父親，淪落三重開小餐館，經常債主臨門，很不好過。而年少的我們偶爾頂撞他，有時也莫名挨罵。

記得有天下午，一個東海補校的同學(已經成年)，長髮飄逸，騎著啞理啞理(時髦)的偉士牌機車(Vespa)來找我(還是來偷看我妹妹?)，聊沒幾句，老爸突然發飆把他趕走，叫我不准留長髮，只能剪五分頭(跟光頭沒啥差別吧)，指著我罵：「你若是給我考著大學，你頭毛留到土腳都無要緊。」三十幾年以來，老爸也去世多年，我一直沒機會把頭髮留長，未曾披肩。那幾年，我們的父子關係時緊時鬆，我開始學抽煙，他知道了，痛罵我一頓，有天卻丟給我一整包未開封的長壽。於是，我差不多十六歲就領到「菸牌」了。

我們的三重歲月雖然只有短短四年，但感覺悠長。那段時間有空便逛書局、舊書報攤、圖書館。我讀到一本評論七等生的書，循線買到他的小說集，在那個民間社會力即將大爆發的年代，善感悶燒的菜市仔少年家就在閱讀〈我愛黑眼珠〉、〈跳遠選手退休了〉、〈來到小鎮的亞茲別〉、〈散步去黑橋〉、〈林洛甫〉的時光中變成喜愛文藝的青年。見到七等生是十多年後的事情了。1993年左右，跟著《新新聞》的朋友到他通霄家裡採訪。與他較為熟悉則是2000年前後在老弟開的地下室酒吧 Front；七等生正在籌劃出版《全集》，我幫他找到一篇以社會學觀點分析他小說的論文作者。這篇論文，據說是有人從中研院的垃圾桶裡挖掘出來的。這件偵探任務始末，以後有機會再詳述吧。

1986，鹿港之夏

回顧歷史，中壢事件揭開整個1980年代自力救濟社會運動風潮的序幕。許信良本是國民黨「吹台青」風潮中培養的本土明星，但

是他在這次縣長選舉中脫黨競選，打敗國民黨提名的對手，並且在選舉過程培養了一批黨外運動年輕幹部(包括張富忠)。此後的美麗島組黨運動，導致國民黨在1979年底大規模鎮壓逮捕；1980年二二八當日的林宅血案；1981年暑假陳文成回台被警總約談後陳屍於台大研究圖書館的草地上(我在那個夏天聯考，考上台大政治系；老爸看報紙分類廣告，頂下和平東路師專對面巷子裡一家水餃店「老任」，於是全家突然「移民」到台北市)；台灣又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。但是國民黨的威權專制已是強弩之末，民間社會反抗國家的集體行動不斷衝撞國民黨設下的警戒線，自力救濟事件層出不窮，讓警方疲於奔命。而黨外運動年輕世代也快速集結；黨外刊物蓬勃，愈查禁愈暢銷，人們競相傳閱。1985-86年自力救濟行動規模愈來愈大，針對性也不斷升高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街上看到新約教會的信徒舉著牌子，手拿大聲公呼口號，牌子上寫著：「蔣經國是暴君！暴政必亡！」新約教徒被憲警特務逼得走投無路。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」這句話一直在耳邊迴響。新約教會這一類集體行動者，把市民社會的抗爭空間撐開了。

1986年鹿港居民的反杜邦設廠運動搞得如火如荼。杜邦公司預定在彰濱設廠生產二氧化鈦，這個投資案因政府決策過程草率而引發抗議。通過張富忠、王菲林等朋友的引介，台大學生在暑假組了一團到鹿港(之前我和幾個社團朋友已經去過一趟)，兩個星期住在柯銘祥(大學論壇社社長)家二樓，當作「公社」；其他時間流竄了幾個地方。我們發傳單，做訪談調查，出版報告書。當時我寫了一篇長文(〈彰濱「反杜邦運動」的初步考察〉)，批評了跨國企業，陳映真讀到，主動拿給《自立晚報》副刊刊登。記得在台大校友會館發表調查報告的那天(我們在鹿港和彰化海邊鄉村總共做了四百多份的問卷)，陳先生還特別來現場看我們。那段期間，我們窩在吳

叡人陽明山上的家十幾天，整理資料，討論下一波行動，日夜打擾他的家人，伯父母的寬容與照顧讓我們得到喘息。報告書的出版耗費了頗多精力。黃武雄教授知道我們埋頭分析資料，鼓勵我們把書編得完整才出版，他並介紹化工系施信民教授寫專文分析二氧化鈦的毒性，並且幫忙找到牛頓出版社。《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》終於在1986年9月中出版。報告書裡整理了我們召開的一個座談會記錄，林志修提到學校派人來鹿港「關切」，調查局也來騷擾。我們最後決定化整為零離開鹿港。那幾百份問卷由許傳盛騎摩托車走縱貫線載回台北，找吳典蓉跑電腦程式。那個暑假前後經歷的事情密度太高了，真是一個發燒狂飆的夏天。《報告書》最後兩頁，列出了當時參與這個調查運動的名單，這些朋友們許多散落世界各地，疏於聯繫，有的不知去向，有的則在其專業中成為佼佼者。這幾年經常出現一個念頭：拍攝一組紀錄片，把參與運動的朋友找回來，談談這些年來的個人轉折，以及當年參與運動的經驗為他們(她們)人生際遇帶來什麼影響？記得我赴紐約讀書(1990年)前，王菲林即提過好幾次，說要留下影像記錄。待我回國，王菲林已經去世，他在盛年突然患病隕落，讓人不勝唏噓。

專制統治的特色是封鎖消息，因此謠言很多。受壓迫的反抗者這邊，因為統治者的分化策略、反抗者的不安全感等因素，有關「抓耙子」(間諜特務打小報告者)的傳聞也很多，這些消息真真假假，難以證實。James Scott所謂的「內部政治」(infrapolitics)常常把受鎮壓團體內部搞得疑神疑鬼、四分五裂。但我親自經歷過的一件則是真的。1986-87年，台大校園從李文忠事件(1986年5月)、鹿港反杜邦(1986年暑假)、大新停社事件(1986年10月)、到自由之愛(1986年底到1987年)這一連串令人沸騰亢奮的運動中，有個學弟一直很積極跟我們混。有一晚吃宵夜，喝了酒，他告訴我們他被調查局吸收，

負責盯我們打報告。怎麼被吸收的？他說他愛賭博，欠賭債，調查局幫他處理，從此就陷入其中。那次告白之後，他就從運動場合消失了。也曾經有同學「受調查局朋友之託」約我到仁愛路四季西餐廳喝咖啡。對許多校園活躍者，「四季」是個熟悉的名字。不知道為何情治單位鍾愛這家西餐廳；這餐廳早已歇業，網路上也搜尋不到蹤跡。

那幾年，新刊物如雨後春筍，吸引許多學運分子投入。有位出獄不久(政治案件入獄)的長輩朋友辦了一份運動刊物，人氣匯聚，大夥經常混在一塊。當時學校社團有人傳說這位主編是抓耙子。在威權統治底下，人們的信任基礎是多麼薄弱？那時才剛解嚴，因為「線民學弟」的經驗，這傳聞一直困擾我。忍不住問陳映真，記得那是個大熱天，在《人間》雜誌附近的一家麵攤。陳先生聽到我的疑惑，微笑著篤定地說：「不至於」。他的回應讓我釋懷。陳先生知道我家開水餃館，經常帶《人間》同仁朋友來光顧。幾次遇到他，他都鄭重其事地、似要激勵我身為勞動無產階級的驕傲般介紹我的「出身」。我總面泛羞澀，那時候我大都在混社團搞活動，要不就在書堆中尋找行動或寫稿的靈感，已經少在家裡幫忙了。

1986年是台灣政治轉型的分水嶺。9月民進黨成立；這之前，林正杰入獄前在各地遊行，已經把街頭反抗運動炒熱。蔣經國決定不鎮壓民進黨(只是報紙仍然把「民進黨」置入引號之中)，並宣布將解嚴、開放報禁。從此街頭更熱鬧了。這一長波段的街頭運動，一直持續到1992年底「第二屆」立法委員選舉之後才逐漸緩和下來。(第一屆立委組成的立法院1948年成立於南京，國民黨自中國搬遷台灣之後從未改選過，只從1970年代開始允許少數的「增額選舉」。)此後，街頭的激情火爆淡出政治舞台，社運主流慢慢進入「制度化」軌道(工會、公民組織、工作室、基金會、國會遊說等等)。

1988年5月20日農民抗爭導致警察的暴力鎮壓，台北火車站一帶，深夜瀰漫著火、水、血混合的煙霧。那是解嚴(1987年)初期最嚴重的暴動與鎮壓。類似的場景，二十年後重現台北街頭，2008年11月中國代表陳雲林來台，引發大規模抗議，剛拿回政權不久的馬政府流血鎮壓抗爭群眾。然而，無論局勢如何變遷，這二十多年來政治轉型，已經讓台灣成爲一個選舉民主體制(或是左翼眼中的布爾喬亞民主)。公民社會也有一定的成熟度。

一個新的因素正在劇烈改變台灣的政治地圖，那就是急速崛起的中國，正以八爪章魚的魔力企圖掌控台灣。冷戰結束帶來地緣政治大變動，世界經濟結構再分工，加上歷史事件的偶合(例如，2001年911事件後，美中緊張關係趨緩)，使中國的崛起如此耀眼而炙熱。中國已經成爲一個資本主義國家，這個國家的性質，根據中共官方的標準說法，是一個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。但事實上，三十幾年來，她的「社會主義」早已底漆斑殘，而「市場經濟」則飽受官僚權貴階級的干預剝蝕。「中國模式」的底蘊是剝削：剝削農工、土地、環境生態。但同時，這個模式也讓國家財力提升，國防壯大，滿足了「祖國站起來」的悲願。

陳映真作爲小說家，社會主義理想國的追尋者，「祖國統一」的使徒，早在1980年代初，即已感知到歷史大變動的蛛絲馬跡。〈山路〉中蔡千惠敏銳覺察時代變動的前震，只是她跟所有同時代人一樣，沒能預知中國在當今世界的輕重。鉅變前，得忍受岩盤錯位的輾碾。吳耀忠與蔡千惠，不是同一種時代角色嗎？

革命在他方：否定的否定

〈山路〉中，蔡千惠的死，一直很迷人。千惠在1950年代來

到貧困的李國木家，她向李家的人佯稱是國木的大哥國坤的遺孀；李國坤被國民黨槍斃，同案還有一個黃貞柏被判無期徒刑；而千惠的大哥蔡漢廷向當局自首，背叛革命同志。幾十年後，國木受良好教育並成為會計師，讓家境改善，過中產階級的生活。這時候千惠卻無端生了重病……。

我找出一份多年前的教學筆記(於清大人社院開設的「台灣社會民主化」)：

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長遠影響。從陳映真的〈山路〉和〈夜行貨車〉可以讀出一些重要的訊息。接續在二二八之後，掃蕩共產黨、清鄉運動，造成台灣社會很深的創傷(social trauma)。高壓恐怖統治，使人民對政治趨於消極畏懼，轉向其他方面發展。城市階級便將子女教育轉向商業、工程、和醫學。而由於美國在冷戰中對台灣的政策，鼓勵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，對台灣開放市場，因此造就了新一代的中小企業家和家族企業。

因國民黨移入台灣而受害的一代，心中充滿怨怒，但是無法公開表露和抵抗，只能在自暴自棄和苟且委屈中生存。他們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，但是這種寄託的內在精神，不是鼓勵他們改革社會的理念，而是一種結合哀怨、虛與委蛇、與認真上進的「生存之道」。「避開政治、用功讀書、努力工作」成為主宰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。我們在〈山路〉和〈夜行貨車〉都不斷看到這種精神的複製。〈山路〉中，蔡千惠(為了愛慕革命青年和理想而獻身的偉大女子)竟也如此教育他的「小叔」(國木)；〈夜行貨車〉中，詹奕宏他那失意的父親，也是如此教育小孩。

情況極端時，偽裝、麻木和雙重標準，在這種精神狀態中表

露無遺：

〈夜行貨車〉的林榮平維持著家庭和情婦的雙重關係；他愛情婦Linda甚於妻子和兒女，但為了維持不斷爬升的機會，他沒有勇氣離婚；甚至在Linda被美籍老闆性騷擾時，也裝作若無其事，繼續討老闆歡心。

美國人和日本人的「經濟和文化帝國主義」的心態，在〈夜行貨車〉和黃春明的〈莎啞娜拉·再見〉表現得淋漓盡致。性騷擾女秘書的美國老闆，開除了「狎妓飲酒」的守衛老張；日本人在台灣四處嫖妓的猖狂，昔日北投、礁溪的繁華(這讓我們反省近年來一些台灣商人在中國的所作所為)。黃春明和陳映真筆下，在跨國企業工作或與外國人有生意往來的台灣人，往往變成「皮條客」、「買辦」。

小說主角的出路和結局。蔡千惠的「慢性自殺」之謎：黃貞柏獲釋歸鄉的消息，倏然挑動了千惠自己所說已經遺忘多年的理想和往事。但是，她為什麼要如此自責、自我折磨？

第一，其兄蔡漢廷出賣革命，咬出很多同志，牽連甚廣，千惠感到一種家族的罪惡感。

第二，在專制、困厄的年代，為了贖罪和理想而到李家去；如今卻過著布爾喬亞般的生活。但是，細數小說中的物件，李家所過的生活，不過是當時台北一般中產家庭的生活，並沒有特別奢華。(作者反物質主義的潔癖，讓國木家的生活與「遠行」歸來的貞柏桑的牢獄禁閉，形成地獄與天國的對比？²)

第三，黃貞柏的歸來，觸動了千惠深埋於心底的既浪漫又刺

2 遠行，即入政治牢獄。

痛的記憶。千惠佯嫁到李國坤家，在少女千惠的心中，乃是「背叛」和貞柏之間的愛情盟約。其實千惠第一次見到國坤，就深受震動，被他的理想和人格所吸引，因此，她曾經幻想著身處貞柏和國坤之間，同時愛慕著兩個革命青年。這是故事引人遐思的地方：到底千惠愛貞柏什麼？女人愛男人的心情，還是仰望著革命家的愛？如果是後者，則他愛慕著國坤也是必然的。國坤已經「殉難」，而被判終身監禁的貞柏竟然獲釋。千惠的心理籠罩在矛盾的情緒：既渴望見到貞柏，卻又不敢面對他吧？更令她痛苦的是，貞柏、國坤等左翼份子寄予希望的社會主義祖國如今「墮落」了，引起千惠的質疑，他們這樣的「犧牲」值不值得？如果不值得，那麼她自己的奉獻犧牲，是否值得呢？何況她所「教養」、呵護而成就世俗欲求的小叔一家（包括她自己），如今是生活在資本主義之物質至上的「家畜化」（何其重的詞？）的世界；這原本是他們要革命的對象啊！這一連串的矛盾和衝突，迷惑了垂垂老矣的千惠，終使她意志消沈、萎靡而死。

假如國坤等左翼革命家是把革命的希望，寄託於祖國，而當祖國的革命竟然墮落了，他們的徹底絕望是必然。可是，這裡不正徵顯著革命份子的幻夢吊詭：把革命的烏托邦寄託在遙遠的「他方」？正是在這裡，我們發現台灣歷史上反抗運動的一種悲劇類型：無法在自己當下生活的社會，紮穩自主自足的實踐腳步。這難道也預言了晚期陳映真的悲劇？

蔡千惠，客觀上死於孤立、自我封閉、充斥悔罪情緒的病室。主觀上，她的求死，是對革命理念的再獻身，是漠視現實的，只想往革命火焰中撲跳的衝動，是對左統路線的否定的否定。

政治團契

莫掀尋革命的皺褶，惟死亡逃離孤獨？浸淫在小說、詩、與社會史。「政治團契」，是我與E多方思辨人的政治認同為何轉向，得到的詞彙。2011年某個秋日筆記：

E要到湖北參訪，台灣方面是夏潮安排，接待方是湖北作協。E的外公叮囑她：「你到大陸去，須小心。個人主義式的言行，在那邊仍然受到注意。」外公是政治犯（於1950年代因為XX鐵路工會案坐牢十五年），近十幾年信仰統派，看來他仍清楚中國的政治與人權實況，但這似乎不減他對統一的熱望，對共產黨的信仰，對國民黨的原諒，對民進黨的嫌惡。E說過：阿公出獄後、與夏潮積極接觸之前，曾訓誡她們：台灣人應該會講台灣話。但是，阿公現在歡喜講國語。

夏潮聯誼會，作為一個政治團契。

E外公接觸夏潮後的轉變，其中關鍵因素是夏潮的論述與行動方針，團體內的親切互動，使他有empowerment的重生感；再獲歸屬；他沉浸在新的敘事認同中，enabling him to make sense of his suffering；政治親密關係。他開始參加神州旅遊團，回家興奮講祖國建設；每天上社區圖書館讀報紙，搜尋大陸新聞並且剪報；某一年，他開始把票投給國民黨。

當異象復臨

2012.2.24下午，差不多讀完整本《尋畫》。心情變得沉重，一

直想著「左翼」問題。心神疲憊不寧。

連續兩天大雨終停了，便往山上走。近黃昏，媽媽說：到福州山就好。我還是上了中埔山。一入富陽公園，原本的小水溝水量變豐沛，洶湧作勢。往鞍部陡升的盤根山徑，變成行水道，必須在泥濘濕土間涉水。往中埔山的一段山壁小徑上方樹木塌落，遂攀沿斷枝繞行山崖，無危險，有趣味。在山頂小寮停留不到十分鐘，空氣悶滯，雨霧不斷籠罩過來，怕天黑太快不好下山。下山的路仍是泥濘鬆軟，只要不怕鞋子陷入泥土，走起來是舒服的。整個過程我的心並不平靜，急著想抓住思緒的流轉變換，這不就是一種病態的浮現嗎——不斷自我詰問，而詰問本身更強化了病的質地。經過長時間的反身思慮、琢磨與探究，我想我愈能夠趨近所謂身心症的內裡去觀想。

昨日早晨讀了一半《尋畫》時，心思是上揚的。真有趣，今日讀完，如此深入那時代的人的困境，而讓我神志低迴。陳素香對於昔日左翼運動同志今日的歸向，有著深深批判，但批判是帶著幾分同理心的。她這樣寫：

魯迅有一句名詩：「忍見朋輩成新鬼，怒向刀叢覓小詩」，我一直誤讀這句詩的意思。以為「朋輩成新鬼」的意思是指「一起搞革命的同輩朋友們成了新統治者的黨羽了」。後來雖然知道了魯迅不是這個意思，但是我的誤讀，對照朋輩之間的選擇和發展，竟也覺得這樣讀魯迅，也挺能描述這三十年間人事情境的轉換。……

其實我一直耿耿於懷這樣的轉換，很想對那些「成新鬼」的朋輩說：革命又沒有成功，當年的浪漫／熱情／理想怎麼就算了呢？但是多半時候，我也漸失銳氣，苟且過日子了。……

追憶吳耀忠，莫忘我們的年少初衷，浪漫情懷雖然不足以完成「革命大業」（革命大業有太多瑣碎的事情要做啊！），但沒有浪漫情懷，怎能抵擋世俗的各種誘惑和腐蝕呢？³

陳素香的喟嘆質問，不單針對左翼傳統，而是對整個社會改革運動的批判。吳耀忠的寫實主義油畫創作，中斷於遠行；而陳映真的人道主義左翼烏托邦，也終結於遠行。⁴ 他們以各自的方法，走向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」創作之路，在台灣當代史上，凝聚凍結於一個時間點，然後是分歧，蔡千惠、吳耀忠、陳映真，乍看角色迥異：

路已岔開

我們

四肢依然盤纏

在平行的軌道

時間，藝術，政治。貌離，神合？小說在時間的皺褶中撩撥細節。詩在時間岩壁的斷裂處尋找一塊新苔。而政治行動呢？

2012.2.28夜：晨又傾盆，午後歇，到山中。在寫作中抒放「縱慾」的矢量。剛讀完尉天驄的〈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〉，點字般一字一字爬行，印證自己的心象與體會。他「把莫斯科和延安設想成自己生命中的耶路撒冷。」⁵ 而我們呢？我想漂回1986年的鹿港夏夜，喚起肢體勞頓但心志柔韌的同伴們，讓我們乘坐在L那輛小貨

3 〈浪漫與遺忘：誌吳耀忠〉，《尋畫》，頁103。

4 兩人的遠行，在1968-1975年，因「民主台灣聯盟案」。

5 《回首我們的時代》（印刻，2011），頁249。

卡的車斗，靈視著這一幕：

當異象復臨

都城宵禁人們

早喪失個性。謠言

湧上街頭地底爬出

鎮暴機器加入造反的

隊伍。拾荒者停止乞食

揀尋花朵與石頭，在聖堂

發願：讓我們挨餓

餓到革命成立的那一刻。

當異象復臨，你說：

讓我們準備好

犬儒主義的最後晚餐⁶

後記

本文初稿寫於2012年3月。之後讀到林麗雲寫作的另一本書《尋畫：吳耀忠的畫作、朋友與左翼精神》（印刻出版）。無意中協尋到幾幅流落江湖的素描，其中一幅「工地連作」，無產勞動者身負重擔的流動光影，令人印象深刻。7月15日，解嚴25週年，應《蘋果日報》論壇版編輯之邀，寫了一篇〈一九八七〉，提及「野百合世代」，

6 林舢，〈一九八六〉，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，2011年07月12日。

青年期受自力救濟啓蒙，社會力責發在我們身上的印記；那個年代，每天都是美好的當下。唯一的遺憾是，我輩迄今沒有創作出引領時代前進的思想，也沒有走出自己的政治道路。把短文寄給朋友，寫道：二十五年前的夏天，掩軋這座島嶼的軍事威權的棘刺網，形式地被拔除了。掩軋的棘刺的形式，三個歷史關鍵字。這個省察，與本文遙通聲氣，故記之。

*作者感謝 M 與 E 的修改建議。

吳介民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。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、政治社會學、台灣、中國。與范雲、顧爾德合編《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-2010：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》（2010）。翻譯 Albert Hirschman,《反動與修辭》（2002）。網址：<http://www.ios.sinica.edu.tw/fellow/wujiehmin/>。